

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视域下《白鹿原》 中白孝文的形象分析

劉 姪 香*

<目次>

- | | |
|---------------------|----------------|
| I. 绪论 | III. 重新树立超我价值观 |
| II. “孝”与“文”的精神希冀与叛逆 | IV. 结论 |

I. 绪论

20世纪90年代, 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与推进, 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一转型也不可避免地对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¹⁾经济自由催生了思想的自由。在这一背景下, 90年代涌现出大量优秀文学作品, 其中“个体”的发现与描绘成为值得关注的主题。作为陕军东征的重要作品之一, 《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地区的白鹿村为缩影, 通过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几代人之间的恩怨纠葛, 生动呈现了白鹿村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相比直接研究历史缩影, 《白鹿原》更为直观地展现了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个体命运的流变。小说中人物的性格特征与精神面貌尤为值得探讨, 而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与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密不可分。在动荡年代

* 고려대학교 중일어문학과 박사과정, 고려대학교 BK21 4단계 중일교육연구단 참여대학생

1) 李丹·吴俊, 〈文学商品化与“人文精神讨论”的代际反应差异——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现象观察〉, 《当代文坛》第2期, 2020, 71-77页.

中，他们的命运更是当时大多数人生活处境的典型写照。

个体的选择往往离不开精神层面的引导。同样，在文学作品的分析中，研究人物主要行为的驱动力时，可以借助精神分析理论展开探讨。以《梦的解析》闻名的弗洛伊德，通过对精神分析理论和性的研究，深入挖掘了人类内心世界的奥秘。²⁾他将人的心理结构划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包括无意识和下意识)，并特别强调潜意识的重要性，认为潜意识甚至比意识更为关键，是精神世界的真实核心。弗洛伊德进一步提出，将人的精神活动划分为自我(意识)、本我(潜意识)和超我(前意识)³⁾，并赋予这些概念全新的诠释。在陈忠实小说《白鹿原》中，作者通过人物对外部环境或本能欲望的追求，塑造了极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即，其主要人物的成长过程，与人本能的欲望相关联，并决定着人物命运的变化。因此，可以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础，解构人物的心理结构，并分别阐释其在面对各种情境时复杂心态的形成机制，从而深入分析《白鹿原》中人物的性格特征。

在现有的研究中，崔家欣将《白鹿原》视为一个整体，并将其中的人物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分类：将鹿子霖、黑娃、田小娥视为“本我”的代表，白赵氏、仙草、白孝文视为“自我”的代表，而朱先生、白嘉轩和白灵则被归为“超我”的代表。⁴⁾然而，笔者认为这种简单的分类方式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原理，个体的人格结构在实际表现中通常是多层面的，“自我”、“本我”和“超我”往往共存，而不是以单一的形式出现。因此，严格按照单一维度划分人物性格并不符合实际。其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通常是复杂且立体的，过于机械的分类会使人物形象趋于扁平化，削弱其丰富性，进而降低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因此，笔者拟从人物在不同认知阶段和立场上的表现出发，分析其“自我”、“本我”和“超我”的动态变

2) 김종민, <벌할 수 없는 죄: 무의식의 코드를 통해 본 《죄와 벌》>, 《러시아어문학연구논집》제34집, 2010, 7-49页.

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Freud,S) 著, 林尘·张唤民·陈伟奇 译, 《自我与本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9页.

4) 崔家欣, <精神分析视域下的白孝文成长解读>, 《名作欣赏》第12期, 2020, 132-134+150页.

化。笔者认为，只有对人物性格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解读，才能更好地理解小说整体内容的内在连贯性，并对作品的核心思想有更为透彻的领悟。

此外，在部分先行研究中，有学者借助与弗洛伊德理论相似的思想框架分析《白鹿原》中的人物特征，例如运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孟子·告子上》“食色，性也”的观点，探讨人物对欲望的追求和其立场的关系。或者有学者认为《白鹿原》是一部浸透了儒家文化思想的优秀长篇小说，而作者在文中着重表现了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精神，因此学者认为从分析《白鹿原》中朱先生、白嘉轩、黑娃和田小娥等人物形象来印证儒家文化精神彰显下的人格魅力的合理的。⁵⁾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儒家思想更强调以礼义来规范人欲，主张将人欲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从而实现个人欲望与社会伦理的平衡，而非通过“性”或“性行为”直接分析主体所体现的意识。这种方法在探究人物对欲望追求背后所隐含的性格特征时存在一定局限性。相比之下，尽管弗洛伊德理论和儒家思想在承认人类对欲望的本能追求方面有一定共通之处，但弗洛伊德通过分析欲望现象来揭示人物性格的方式，揭示了儒家思想难以触及的深层心理动因。因此，在研究《白鹿原》中人物的性格特征时，弗洛伊德的理论能够提供更独特的视角，补充儒家思想的不足之处。

II. “孝”与“文”的精神希冀与叛逆心理

每个人在不同阶段都不会仅表现出单一的心理状态。从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看，“自我”、“超我”和“本我”始终处于动态调节与相互转化的过程中。⁶⁾换句话说，本我往往受到超我价值观的压制，自我与本我则在超我的作用下不

5) 崔雪茹·温舒雅, 〈儒家文化对小说《白鹿原》中人物的影响探析〉, 《喀什大学学报》第2期, 2022, 48-53页; 杨康鑫, 〈儒家文化精神彰显下的人格魅力——《白鹿原》人物形象浅析〉, 《黑河学刊》第2期, 2012, 18-19页.

6) 谢子良·白梦瑶, 〈弗洛伊德人格层次理论视角下《我不是药神》的创意经验〉, 《声屏世界》第20期, 2024, 65-67页.

断平衡与转化，而超我本身也会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调整。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白鹿原》中的人物形象也随着社会变迁，呈现出不同价值观影响下的自我表达。以白孝文为例，他的成长经历便是这种价值观动态变化的缩影。早期的白孝文深受传统儒家超我价值观的支配，他将本我欲望完全压抑，成为传统价值观的典型体现。然而，这种长期的压制使得他的本我欲望逐渐积累，最终在特定的契机下爆发，开始否定过去一直支配他的超我价值观。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白孝文逐渐建立起新的思想体系，并形成了新的价值观，成为他行为的新导向。这种过程展现了他在价值观冲突与重塑中的复杂性与动态性。

《白鹿原》是陈忠实先生创作的一部以丰富的人物形象展现现代主义逐步渗透农村生活的经典之作。⁷⁾陈忠实对小说人物的塑造极为精细，成为研究这部作品的重要切入点。为了体现人物的复杂性和层次感，作者在细节上下了很大功夫。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之一，白孝文的名字本身便揭示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在中国传统小说中，人物名字往往蕴含深意，传达其命运与作品的内在主题。例如，《红楼梦》中曹雪芹通过“贾雨村”的“假语存”和“甄士隐”的“真事隐”暗示了人物命运及小说深层含义。在《白鹿原》中，陈忠实同样采用了这种写作技巧，通过名字赋予人物独特的象征意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白孝文。

白孝文出生于一个“耕读传家”的封建家族，是族长白嘉轩的长子。他的名字“孝”“文”直接反映了儒家礼教对他的期望与塑造。他被视为族长的继承人，拥有安稳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教育资源。面对黑娃因爱田小娥而挑战伦理的行为，白嘉轩加倍严格管教白孝文，希望他成为家族的骄傲，而白孝文的言行举止也一度符合这种期许，成为父亲引以为傲的存在。

“孝文是好样的，穿着旧衣服每天三晌跟着鹿三去地里学务庄稼，一身土一身汗不叫累。”⁸⁾

7) 张宸·付宇轩·马鸣，〈当代乡土文学中农民形象塑造—以《白鹿原》为例〉，《中原文学》第14期，2024，12-14页。

白孝文一直表现得非常单纯, 连结了婚如何和媳妇同房都不知道。作为下一任族长继承人的身份, 一直生活在封建的家族教育之下。为了担负起族长一职从不敢有过一丝的懈怠。

“他不摸牌九不擲色子, 连十分普及的纠方狼吃娃媳妇跳井下棋等类乡村游戏也不染指, 唯一的娱乐形式就是看戏。”⁹⁾

继任族长后, 他修缮祠堂, 重绘族谱, 重新聚拢人心, 消除了“风搅雪¹⁰⁾”和“还乡团¹¹⁾”的影响, 恢复了白鹿仁义村的井然有序, 当狗蛋和田小娥的事情被抓到祠堂接受刑法时, 白孝文从刚开始的略显紧张到后来对这件事情表现出冷漠的一面。

“孝文走到狗蛋跟前, 推走了鹿子霖, 再接过刺刷迎面抽去。”¹²⁾

白孝文在面对刑法时, 从最初的紧张到后来“迎面”展现出的从容, 生动地刻画了他“超我”的形象, 这一描写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白孝文身上所承载的传统儒家正统价值观。因此, 在这一阶段的白孝文, 不仅是父亲白嘉轩的骄傲, 也成为整个白鹿原的典范人物。他的行为和态度充分体现了封建思想禁锢下的传统“超我”特征。

然而, 从白孝文的成长历程中可以看出, 在这种严苛的压制之下, 他依然保留着一丝原始的欲望。陈忠实通过细腻的笔触, 揭示了白孝文“本我”的一面, 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欲望和权力的追求上。早期的一个典型场景是, 白

8) 陈忠实 著, 《白鹿原》,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146页。

9) 陈忠实 著, 同上书, 130页。

10) “风搅雪”, 抗日大业与赈灾济贫等一系列关乎民族存亡与一方兴衰的重大事件

11) “还乡团”, 又称返乡团, 还乡队(英语有译Homecoming Legion)。是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由中国国民党组织的地主武装, 在全中国范围内的农村进行了大规模的肉刑及屠杀, 许多自然村的大半人口都死于还乡团之手。

12) 陈忠实 著, 同上书, 231页。

孝文在初次行房事后迅速沉溺其中，从他“纵欲过度”的神态中，便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欲望的释放。这一描写揭示了白孝文在表面从容和传统价值观束缚下暗藏的内心冲突与复杂性。

“孝文的脸色仍然发暗发灰，眼睛周围有一个晕圈儿，明显不过地呈现着纵欲过度地样子”¹³⁾

后经白赵氏的监管和压抑之后，转而将这种欲望转化为“超我”所容许的一种状态。在田小娥出现之前白孝文表现出的是超我大于本我。但是从此之后，白孝文便发生了改变。

白孝文的堕落可以说是鹿子霖精心策划的结果，同时也是白鹿两家争斗中的牺牲品。这场争斗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上一代。鹿子霖的祖辈鹿马勺，以精湛的厨艺发家致富，奠定了鹿家以商业为核心的家族传统。而鹿子霖本人对权力的渴望丝毫不逊于白嘉轩，甚至一直觊觎白嘉轩的族长地位。由于受到祖制的限制，鹿子霖无法直接实现自己的野心，但他通过各种手段试图瓦解白嘉轩的权威。¹⁴⁾鹿子霖的策略从多个方面体现了他的野心。例如，他通过设计低价从白孝文手中买下白嘉轩的水地，利用当上乡约的身份耀武扬威，并安排田小娥诱惑白孝文，最终导致白孝文深陷泥潭。这些行为不仅是鹿子霖权力欲的体现，也揭示了白鹿两家争斗的文化背景：白家代表传统的“耕读传家”的儒家土地文化，而鹿家则代表以商业为基础的近代资本主义工商文化。这种文化上的对立实际上是宗法社会与小农经济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冲击下的矛盾延续。资本主义的兴起逐渐侵蚀了传统的小农经济，也加速了儒家文化的衰退。¹⁵⁾

13) 陈忠实 著，同上书，155页。

14) 田国平，〈以小见大——从《白鹿原》中的家庭纷争看社会的发展〉，《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所. 2022教学发展网络研讨会论文集(一)》，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所，2022，3页。

15) 王元周·徐鹏 著，〈近代中国：地域秩序于社会变迁〉，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793页。

鹿子霖通过对白孝文的蓄意陷害，不仅摧毁了白嘉轩对家族宗法秩序的维护，也破坏了宗法社会的稳定。最终，白孝文在鹿子霖的陷阱中彻底堕落，从族长继承人的高位跌入社会的最底层，成为一名乞丐。至此，白嘉轩对“孝”与“文”的期盼也彻底破灭，标志着白家传统价值观的彻底崩塌。

白孝文被引诱到田小娥的床上，实际上是命运的必然结果。即便没有鹿子霖的阴谋或白嘉轩的暴力驱逐，他内心深处长期被压抑的性欲反弹也迟早会将他推向田小娥或其他女性。这表明，在“超我”的长期压制下，白孝文内心的“本我”欲望终究会彻底爆发。

在分家之后，白孝文对这种原始欲望的放纵达到了极端。他首先表现为对性欲的沉迷与无法节制。早期，由于房事受到媳妇的强烈控制，白孝文一度陷入性无能状态，即使面对田小娥时也难以表现正常。这一阶段揭示了白孝文在“超我”持续支配下所展现出的身体和心理的异样反应。这种反常状态既反映了他深陷传统伦理束缚的无力挣扎，也为他之后彻底放纵欲望埋下了伏笔。随着故事的发展，当白孝文因卖地和与田小娥私通被发现后遭到惩罚，他开始真正感受到性欲带来的强烈吸引力。从这一刻起，白孝文彻底挣脱了“超我”的束缚，完全展现出“本我”的姿态。

这一转变首先体现在他对性欲的沉溺上，特别是在与田小娥的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不仅与田小娥私通，还因此抛弃了自己的妻子。按照封建礼教的规范，尊重妻子是重要的道德准则，¹⁶⁾但白孝文完全无视这些教义，甚至任由妻子在家中凄凉地死去。这一行为进一步突显了他的“本我”意识占据了主导地位，完全背离了封建礼教下“超我”对其行为的约束。这些种种表现清楚地说明了白孝文内心深处对“超我”压制的报复，以及对本能欲望的不加掩饰的追求。他的行为不仅是对传统道德的背离，更是他内心深层矛盾的一种极端释放。

“大姐儿眼睛转了半轮就凝滞不动，嘴角扯了一下露出一缕羞怯。白赵氏仙

16) 张庆荣,〈封建礼教中扭曲的人性〉,《语文学刊》第14期,2015,89-90页。

草和二姐儿全都闻声奔过来。孝武四处奔走，找不见孝文。”

孝文刚刚办完买房的手续，三件门房全部卖给鹿子霖，把所得的银元顺路撂在小娥的炕头上，知道半夜才回来。”¹⁷⁾

由此可见，白孝文“本我”已经凌驾于封建礼教的超我意识之上，即，白孝文已经彻底迷失自我，逐渐走向叛逆，走向欲望的深渊。

其次，白孝文对鸦片的沉迷进一步加深了他的堕落。当田小娥第一次拿出烟枪，试图与他共享鸦片的快感时，白孝文脑海中浮现的竟是朱先生在讲禁烟时的失态。然而，为了报复“超我”的长期压制，再加上鸦片的诱惑，他最终无法抗拒，开始吸食鸦片，并迅速沉迷其中。鸦片的侵蚀使白孝文彻底失控，最终沦为沿街乞讨的乞丐。

在乞讨的过程中，白孝文为了生存不得不低头求助，而周围的村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或怜悯。这些已将“超我”融入潜意识的村民，对他更多的是奚落和嘲讽。这种来自社会的羞辱使白孝文彻底跌入人生的谷底。然而，真正促使他开始反思并向“自我”转变的，是长辈鹿三的嘲弄。鹿三的言辞刺痛了白孝文的内心，使他在深刻的羞辱中逐渐意识到自我重新定位的必要性。这一过程标志着白孝文在自我意识上的一次重要转折。

“你原先是人上人，而今卧蜷在土壕里成了人下人。你放着正道不走走邪路，摆着高桌低凳的席面你不坐，偏要钻到桌子底下啃骨头，你把人活成了狗你还装嘴硬说不后悔，你现时后悔说不出口咯！”¹⁸⁾

鹿三深受白嘉轩的影响，更像是封建礼教制度下“超我”的卫道者，其对白孝文的奚落更是超我对本我的无情奚落。正是此次奚落，让原本软弱的白孝文认识到了超我统治的根深蒂固。由此可以说前期的白孝文身上有本我的影子，且这种本我的因素受到了超我和自我的压抑。白孝文的堕落象征了宗

17) 陈忠实 著，同上书，317页。

18) 陈忠实 著，同上书，330页。

族势力的衰败。他的名字“孝”与“文”本身承载了父辈的殷切期望和延续宗法文化的重任。无论家族经历怎样的变化，白家的势力和族长地位始终牢不可破。作为族长世家，白家通过自身行动和严苛的族规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威望，这种传统贯穿始终。

在关中文化中，长子历来被寄予厚望，但同时也肩负着沉重的压力，几乎没有任何自由。¹⁹⁾他不仅是宗族血脉的继承人，更被要求承担起维护和延续父辈传统的责任。然而，白孝文的“叛逆”打破了这种期望。他选择背弃传统束缚，毫不犹豫地否定并唾弃这种冷酷无情的宗族制度。这种背离既是对传统的反抗，也是他内心挣脱压迫的呐喊，象征着宗族文化在时代变迁中逐渐走向崩塌的过程。

“过去要脸就是个怪样子，而今不要脸了就是这个样子，不要脸就像个男人地样子了。”²⁰⁾

从深层次来看，这揭示了宗法家庭的内部瓦解，也是宗法家族对儒家文化和宗族权威的自我否定。随着时代的发展，家族成员逐渐意识到“存天理，灭人欲”的规矩或信仰并不符合人性的合理需求。当人们开始对这些传统进行反思时，落后的文化和规制便逐渐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宗法社会也因此失去了赖以维系的根基。关中地区自古以来形成的宗法社会共同体，在这样的变革中逐步走向解体。从文化的衰落到个体意识的觉醒，宗族的地位不断被削弱。²¹⁾这种转变不仅标志着传统社会结构的松动，也昭示了个人价值在新兴时代的崛起。²²⁾白孝文对儒家文化和宗族文化的抛弃，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行为，更深层次地反映了以他为代表的一代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同时也折射

19) 何文钦,〈浅窥《白鹿原》中的关学文化传统〉,《甘肃开放大学学报》第6期,2023,55-58页.

20) 陈忠实 著,同上书,312页.

21) 韩星·Zhu Yuan,〈白鹿原、《白鹿原》与儒家文化和关学〉,《孔学堂》第3期,2016,16-26+122-127+27-34页.

22) 王元周·徐鹏 著,同上书,795页.

出这一群体在面对传统与变革时的选择。

III. 重新树立超我价值观

在经历了精神和肉体的重创后，白孝文走出了白鹿原，摆脱了宗族制度的束缚，转而投身于与社会新兴政治力量结合的道路。这一选择，与鹿子霖的道路在本质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的经历，或者说这一类人的命运轨迹，不禁引发深刻的思考：为何中国会涌现出如此之多表面饱读诗书、满口仁义道德，却内心腐败不堪的人？这一现象实际上是中国传统道德理论绝对二元化的表现之一。²³⁾这种二元化割裂了个人的外在言行与内心世界，形成了道德与真实行为间的深刻矛盾，为白孝文和鹿子霖这样的人物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黑娃虽然也曾堕落，成为土匪并做过坏事，但他的堕落并未达到“无耻之耻”的程度，因此最终能够改过自新，成为一个好人。而白孝文则不同，他经历的大起大落远超黑娃所能企及。极端的压制与放纵，使他在新的环境中逐渐建立起新的“超我”价值观。黑娃在人生的种种酸甜苦辣中，对生命有了深刻的感悟，并在苦难中幡然悔悟，追求向善。

他跪在朱先生跟前说：“兆谦闯荡半生，混账半生，现在想念书求知活得明白，做个好人。”²⁴⁾

黑娃在经历人生波折后，开始了自觉的脱胎换骨。他几近残忍地摒弃了过去的一些恶习，坚决地逼迫自己接受并培养出一个好人应有的品格。而后期的白孝文则找到了平衡“本我”和“超我”的方法，通过融入“自我”角色重新建

23) 梁鸿 著，《“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善变(第二版)》，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163页。

24) 陈忠实 著，同上书，582页。

立新的“超我”价值观。

而白孝文也经历了丰富的人生滋味，但由于性格天性的差异，他的觉醒过程显得更为复杂与艰难。黑娃的反思源于内心向善的执念，而白孝文的转变则更像是命运洪流裹挟下的被动选择，两人展现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白孝文在调整过程中，一方面对“超我”保持了适度的尊重，另一方面也为“本我”的需求提供了部分或间接的表达。他凭借世俗的圆滑与灵活，巧妙地协调了“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使自己在新的人生阶段中找到了一种动态的平衡。

白孝文进入县城后，接受了新的思想熏陶，受到了新环境的强烈刺激。他跟随岳维山等人从事各种事务，逐渐成长为一个机敏的办事人。在唯唯诺诺和曲意逢迎中，他成功赢得岳维山的信任，成为其得力助手。凭借八面玲珑的手段，他在复杂的环境中左右逢源，步步高升，最终摇身一变成为营长。为了彰显自身的地位和身价，他精心策划了一场回乡拜祖的活动，意图借此展现他的全新身份与成就。

“以一个营长的辉煌彻底扫荡白鹿村村巷土壤和破窑里残存着的有关他的不光彩记忆”²⁵⁾。

在新的环境中，白孝文彻底摆脱了乡约伦理的束缚，受外部影响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个人伦理准则，这也成为引导他自我状态的全新“超我”价值观。然而，返乡并非易事。面对白嘉轩的冷漠与排斥，白孝文并未气馁，而是不断托人说情，最终攻破了白嘉轩的心理防线。但白孝文真的认为“月是故乡明”，家乡比外面更好吗？其实不然，他的意图另有所指。回乡拜祖之后，他对后娶的妻子坦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揭示出他的返乡行动背后的深层动机。

白孝文：“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

25) 陈忠实 著，同上书，496页。

他的妻子奇怪他的想法，反问他：“可你还是想回来。”

白孝文说：“回来是另外一码事。”²⁶⁾

白孝文心中的“另外一码事”寓意深远，让妻子难以猜透。这不仅仅是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更是为了为白鹿原的族人争光。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让白嘉轩切实感受到作为长子的影响力。最终，白嘉轩从族人对他的赞扬中获得了心理安慰，听到乡亲们议论“龙种终究是龙种”，白家的光环再次闪耀，重塑了“白家的德仪门风”，也让族人重拾对家族的敬意。

虽然白孝文并不打算长居乡里，但他执意要买回当初卖给鹿子霖的旧居并重新修建。这座新房象征着主人的荣耀归来，标志着他从昔日的狼狈不堪蜕变为如今的意气风发。因此，白孝文的拜祖回乡行动，即使内心深处仍厌恶旧环境，目的却是让曾经轻视他的人刮目相看。他追求的不仅是个人的自尊，还包括家族的荣耀、父亲的骄傲，以及重新塑造白家在族人心中的威望，同时借此化解他与白嘉轩之间的紧张父子关系。“自我”位于“本我”和“超我”之间，起到调节两者关系的作用。它源于“本我”的分化，却受到“超我”的规束与陶冶，逐渐表现出一种圆融世故的特质。²⁷⁾“自我”能够根据环境的实际情况，在“本我”和“超我”之间进行调和，解决两者间的矛盾，并根据当前的条件选择合适的行为方式。这种意识通常被称为理性或正确的判断。“自我”的行为遵循“现实原则”，在满足道德要求的同时，避免因过度理想化的道德规束而压抑本能欲望所带来的痛苦。它既能适应外界环境的要求，又能在道德与欲望之间找到平衡，从而实现心理的稳定与行为的合理性。²⁸⁾白孝文凭借自己的圆滑手段最终步步高升，成为县长。他一方面安抚白嘉轩，回乡祭祖，展现对家族的“孝心”，另一方面却策划了对黑娃的杀害，从中谋取最大的利益。白孝文的行为并非完全遵循客观要求，更不可能完全放弃自身的根本利

26) 陈忠实 著，同上书，504页。

27) 张茜如，〈从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理论来看《罪与罚》主角双重人格的形成〉，《今古文创》第42期，2024，6-28页。

28)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Freud,S) 著，陈伟奇译，同上书，09页。

益，而是巧妙地在道德和现实之间寻找平衡，避免让自己遭受过多的损失，同时最大化自身的得益。这种精明的算计，体现了他对现实环境的高度适应能力和对个人利益的执着追求。

白孝文经历了从受“前意识”控制的超我约束，到自我放逐中本我的解放，最终凭借自身优势找到欲望与规束的平衡，形成了一种新的超我价值观，实现了一种特殊的“自我”目标。然而，他最终呈现的“自我”状态却带有极强的自私性，认为要活得好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清除所有阻碍，无论对方是谁。在起义之前，他毫不手软地枪杀了曾一直提携他的保安团张团长；起义之后，他又反手将黑娃置于死地。他的残酷和冷血，完全以自身利益为中心，无视他人情谊，只为确保自己的生存和成功。这种无情的自我实现，充分展现了白孝文性格中深刻的功利性与冷酷面。

最终，白孝文虽然得到了白嘉轩的原谅，再次成为白嘉轩的骄傲，但此时对于“孝”与“文”的期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尽管白孝文成为县长，在众人眼中似乎达到了“孝”与“文”的最佳归宿，但他最后表现出的“孝”与“文”却完全背离了原本的意义。为了满足一己私欲，白孝文设计陷害黑娃，导致黑娃惨死，这表明他所谓的“孝”与“文”不过是个人伦理的体现，或者说仅仅在某种程度上与乡约伦理再度重合而形成的表面和谐。然而，这种伦理却与更广泛的社会伦理背道而驰。换句话说，白孝文在个人伦理和乡约伦理之间找到了某种程度的平衡，但与此同时，他的“自我”与整个社会伦理发生了冲突。白孝文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伦理之上，这种行为不仅偏离了道德规范，也反映了他畸形人格的形成。这种“孝”与“文”不仅是对传统价值的背叛，更是在新环境中个人伦理对公共伦理的一种扭曲的表达。

现代化的进程并非一蹴而就，尤其在农村这一背景下更为缓慢。由于封建思想在农村根深蒂固，现代化的影响在传入时不可避免地与传统观念发生激烈碰撞。同时，信息的滞后和传播的局限性进一步延缓了农村现代化的步伐，使其具有显著的迟滞性。²⁹⁾在这一过渡时期，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常呈现出

29) 周水涛，〈城市进逼下的乡村—90年代农村小说的文化思考〉，《小说评论》第5期，2002，27-32页。

不同的极端。一部分人固守封建思想，顽固不化，拒绝接受新观念；另一部分人则在释放天性的过程中表现出心理的扭曲和行为的异化。只有少数人得益于现代教育，逐渐融入现代化的进程。通过分析这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当时人们在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的困境，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复杂而扭曲的心理状态。这种探索有助于揭示农村社会在变革期的深层次矛盾和人性挣扎。³⁰⁾

从某种意义上看，无论白孝文处于何种境地，他这样的人物形象都无法被抹去。因为他超越了所有观念束缚，将“生存”作为唯一的准则。他的最高原则是活下去，且活得更好。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可以牺牲其他一切原则。然而，这种对生命执着追求的态度，恰恰能引起绝大多数人的共鸣。总的来说，白孝文最终走出了白鹿村，摆脱了与田小娥的过往。他对待父亲不忠不孝，对待族人仁不义，对待族规毫无尊守，但他选择投身于更广阔的社会，彻底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在变革的社会环境中，他展现了极强的适应能力，能屈能伸，以此应对人生的波折与挑战。最终，白孝文在人生的坎坷中找到了一种平衡“超我”和“本我”的方式，即实现了对“自我”的准确认知。这种认知不仅是他个人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多数人性中适应环境、追求生存的本质。

陈忠实为白孝文设置这样的结局，不仅是对以“孝”与“文”为象征的儒家思想的深刻反思，更是对社会上那些满腹经纶却为个人利益不择手段之人的辛辣讽刺。《白鹿原》记录了从清末到国共合作、中日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这一动荡的政治时期。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人物的性格随着时代与立场的变迁不断变化。因此，用简单的方式对人物进行划分显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些人物的行为和思想并非单一维度的体现，而是其所处特定历史环境与内心复杂性格共同作用的结果。陈忠实通过这些多面性的人物塑造，不仅展现了动荡时代的社会面貌，也引发了对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人性冲突的深刻思考。

30) 杨一多，〈作为“精神救济”与“求生意志”的民俗——重看20年代乡土小说〉，《社科纵横》第4期，2024，154-160页。

IV. 结论

本文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长篇小说《白鹿原》中主要人物白孝文进行了深入分析。《白鹿原》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在本能欲望的驱使下沿着各自的轨迹发展,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从表面上看,陈忠实的《白鹿原》似乎只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和时代更迭的描绘,但通过深入研究不难发现,作品中蕴含了丰富的心理和精神元素。人物的发展及行为轨迹与精神分析理论密切相关,成为理解作品的重要切入点。可以说,这部作品不仅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更是对人性真实状态的深刻揭示。即使现代社会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作品中的人性描写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白孝文与鹿兆鹏、鹿兆海同龄,也同样接受过教育,但由于深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他选择压抑自己的欲望。然而,经历了一系列事件后,他的形象并未走向积极的方向,而是逐渐呈现出一种扭曲。

陈忠实对白孝文这一特殊性的刻画,正是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命运的缩影。这类人既未继续坚守封建思想的统治,也未能顺应社会潮流迈向积极的方向,而是脱离轨道,陷入颓废,最终形成一种自认为正确的价值观——即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新价值体系。这种“自我”的形成,不仅是个人心理的结果,更是社会动荡与文化冲突的深刻反映。小说的结尾为每位主要人物都安排了明确的结局:鹿子霖疯癫成疾,最终惨死在自家的柴房中;田小娥被鹿三杀害;白嘉轩则用自己的一生守护着白鹿原。然而,唯独对白孝文的最终命运,书中并未作出明确交代。白孝文的一生充满波折,各个人生阶段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特质,使得他的形象难以被简单归类,也为读者留下了深刻的思考空间。

弗洛伊德从生理和心理的视角出发,研究个体的本能,以先天的生物性和心理驱动力来界定本能的性质,并通过潜意识与欲望两个层面揭示本能的根本特征³¹⁾然而,当人们真正置身于社会中时,心理状态不仅仅受到这两个

31) 李阳 著,《从压抑的文明到非压抑的文明》,杭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因素的影响。换言之，在无奈的社会背景或既定规则的约束下，人们所表现出的心理变化无法完全通过弗洛伊德的理论加以解释。因此，仅依靠弗洛伊德的欲望原理来分析小说人物，难免会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正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重要原因之一。

白孝文这一角色深刻体现了现代性困惑的多维度与深层次。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中，他既承载着家族期望与传统礼教的沉重枷锁，又无法抗拒现代性浪潮对个体欲望与自由的强烈呼唤。这种冲突不仅表现在他内心传统价值观与现代开放观念的对抗上，更体现在他个体欲望与社会规范之间的难以调和。随着身份认同危机的浮现，白孝文开始质疑自己作为族长继承人的角色定位，渴望探索更广阔的人生与真实的自我。然而，这一过程充满了痛苦与挣扎，他不断在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社会之间摇摆，最终陷入了对人性本质的深刻反思。白孝文的故事，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沉浮录，更是对现代性困境下人类普遍面临的矛盾与挑战的一次深刻剖析，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中个体的成长、价值追求与心灵挣扎提供了宝贵的镜鉴。

〈参考文献〉

- 陈忠实 著，《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 崔家欣，〈精神分析视域下的白孝文成长解读〉，《名作欣赏》第12期，2020。
- 段建军 著，《陈忠实研究论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
- 高兴 著，《城市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理论、视角与案例》，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20。
- 韩星·Zhu Yuan，〈白鹿原、《白鹿原》与儒家文化和关学〉，《孔学堂》第3期，2016。
- 何文钦，〈浅窥《白鹿原》中的关学文化传统〉，《甘肃开放大学学报》第6

- 期, 2023.
- 姜鑫磊, 〈行走在灵魂深处的人物——《白鹿原》之白孝文〉,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6期, 2012.
- 李丹·吴俊, 〈文学商品化与“人文精神讨论”的代际反应差异——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现象观察〉, 《当代文坛》第2期, 2020.
- 李清霞 著, 《陈忠实的人与文》,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 李阳, 《从压抑的文明到非压抑的文明》, 硕士学位论文, 杭州师范大学, 2022.
- 梁鸣 著, 《“灵光”的消逝: 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第二版)》,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1.
- 刘芸, 〈论儒家文化对《白鹿原》的塑造〉,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4期, 2022.
- 田国平, 〈以小见大——从《白鹿原》中的家庭纷争看社会的发展〉,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所. 2022教学发展网络研讨会论文集(一)》,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所: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所, 2022:3.
- 王元周·徐鹏 著, 《近代中国: 地域秩序于社会变迁》, 江苏: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
- 卫世平, 〈浅谈《白鹿原》中白孝文命运的嬗变〉, 《名作欣赏》第11期, 2022.
- 谢子良·白梦瑶, 〈弗洛伊德人格层次理论视角下《我不是药神》的创意经验〉, 《声屏世界》第20期, 2024.
- 邢小利 著, 《陕西文学研究(第二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5.
- 许子东 著, 《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21.
- 杨一多, 〈作为“精神救济”与“求生意志”的民俗——重看20年代乡土小说〉, 《社科纵横》第4期, 2024.
- 张宸·付宇轩·马鸣, 〈当代乡土文学中农民形象塑造——以《白鹿原》为例〉, 《中原文学》第14期, 2024.
- 张茜如, 〈从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理论来看《罪与罚》主角双重人格

- 的形成), 《今古文创》 第42期, 2024.
- 张庆荣, 〈封建礼教中扭曲的人性〉, 《语文学刊》 第14期, 2015.
- 赵德利·孟改正, 〈论《白鹿原》三段论手法的美学意义〉,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6期, 2002.
- 赵卫东 著, 《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研究资料》,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
- 周水涛, 〈城市进逼下的乡村—90年代农村小说的文化思考〉, 《小说评论》 第5期, 2002.
- 김종민, 〈별할 수 없는 죄: 무의식의 코드를 통해 본 《죄와 벌》〉, 《러시아어문학연구논집》 제34집, 2010.
- 劉姪香, 《1990년대 중국의 ‘산시(陝西) 작가 열풍’과 작가의 지역 문화심리》, 석사학위논문, 2024.
- 임환모·엄영욱·전영의, 〈《白鹿原》與《太白山脈》叙事策略比较研究〉, 《중국학논총》 제68집, 2020.

〈Abstract〉

In the 1990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and promo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social life underwent profound changes, and this transformation inevitably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ultural field, bringing about unprecedented creative freedom. Economic freedom gave rise to intellectual freedom. Against this backdrop,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literary works emerged during the 1990s, with the discovery and portrayal of the “individual” becoming a subject of great interest.

As one of the key works from the Shaanxi Army’s Eastern Expedition, White Deer Plain is epitomized by Bailu Village in the Guanzhong District of Shanxi Province. Compared to directly studying a historical

microcosm, White Deer Plain more intuitively showcases the changes in individual fat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sychological states of the novel's characters are particularly worth exploring, and their depiction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historic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exist. In turbulent times, their fates serve 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circumstances faced by most people of that era.

Freud divided the mental structure into the conscious, preconscious, and subconscious (including both the unconscious and subconsciou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subconscious mind as being even more critical than consciousness itself—the true core of the human psyche. Therefore, it is possible to deconstruct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s of the characters using Freud's psychoanalytic theory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ir complex mentalities when confronted with various situations.

Keywords: 《白鹿原》(White Deer Plain), 佛洛伊德(Freud),
精神分析理论(Psychoanalytic Theory), 白孝文(Bai Xiaowen)

